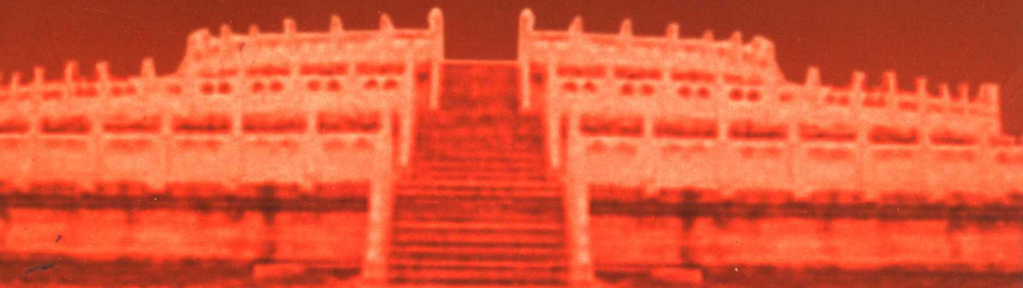



神灵世界

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王柏中 著




 民族出版社

神灵世界

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王柏中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
制度研究/王柏中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

ISBN 7-105-06898-1

I. 神... II. 王... III. 祭祀—风俗习惯—研究—
中国—两汉时代(前 202~220) IV. 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34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9.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王柏中（1966——），男，祖籍辽宁铁岭调兵山。广西民族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广西儒学会会员。科研方面，曾参编《鞍山市民族志》，合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集安》，主编《八桂田野：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01级学生田野研究论集》，并在《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汉代庙制问题探讨》等学术论文十余篇；教学科研方面，所制《中国古代史（原始社会）》CAI课件，在2001年分别荣获“东北地区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优秀教学软件奖和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软件二等奖。

序 言

王柏中博士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一书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有益于学术的好事。因为这是一部比较深入研究汉代祭祀活动和祭祀礼仪的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在秦汉史研究领域，对祭祀活动的考察，尽管前人作了一些必要的研究，但是，对祭祀活动以及与祭祀相关的诸问题，仍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王柏中博士注意到对两汉祭祀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汉代国家宗庙制度研究》这一硕士论文。攻读博士学位后，他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又继续拓展和加深这方面问题的考察，对汉代的祭祀活动、国家祭祀礼仪、国家祭祀制度、祭祀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其一，作者的研究注意到摆脱历代礼学研究的束缚，将对汉代祭祀的研究与两汉时期的宗教活动以及汉代人的宗教意识的考察联系起来，因而他所作的研究实为对汉代宗教活动特点的探讨。

其二，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国家祭祀礼仪作了细致的考证，对郊祀、社祭、宗庙之祭以及陵寝祭的定期祭祀和不定期祭祀提出了值得注意、比较新颖的看法。他特别注意对郊祀和宗庙之祭礼仪的发展演化的特点的探讨，注意透视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时期这两种国家祭祀所表现出的不

同状况,使郊祀、宗庙之祭不同同时段的礼仪特征得到明晰的展现。

其三,作者注意到对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的研究。我们知道祭祀活动在两汉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祭祀活动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方面。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家将对祭祀活动的管理置于很重要的位置。两汉国家在这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制度。作者对两汉国家祭祀制度作了细心的考察。这种考察涉及两汉的官制、国家的财政、国家的乐舞与国家祭祀制度的联系,这不仅使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的构建和演变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考证,也使两汉国家祭祀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联系获得了有益探讨。

其四,作者注意对涉及到两汉祭祀的资料搜集,不仅搜集了传世文献的史料,也注意搜集简牍、碑刻以及考古资料中涉及祭祀的史料,因而使作者的探讨,具有了很坚实的史料基础。

王柏中1990年毕业于锦州师范学院政史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对中国古代史有浓厚的兴趣,后考入吉林大学,成为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攻读秦汉史,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勤,并进一步确定了他的钻研目标。硕士毕业后,致力于国家祭祀制度方面的系统探讨,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攻读博士学位后,学术视野更开阔,因而成功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这部专著,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钻研的结果,其中凝聚了他多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和国家祭祀制度史探讨的研究心得。

王柏中博士笃志好学,具有坚实的文献功底和对问题的敏锐的洞察能力,因此,他能够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取得重要的收获。今后,希望王柏中博士在这个领域中继续努力,辛勤的耕耘,一定会有更多的建树和新的学术成果问世。王柏中博士嘱我为序,我略述数语,与作者共勉。

张鹤泉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日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绪 论

一、研究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的学术价值

选择两汉国家祭祀作为研究题目，主要是基于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首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中国古代文明的自身发展具有相对独立的进程，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因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而中断，文明发展的内在延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这一发展过程，不但确立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自身也形成了许多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礼便是其中之一。礼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起源早，而且一直贯穿到近现代，称得上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文化标志。^① 礼在中国文化中的这一核心地位，是得到世人广泛认同的。从礼的内容上看，它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宗教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广泛的价值体系。关于礼的内容，存在多种归纳方法，其中主要的如《礼记·昏义》把礼分为冠、婚、丧、祭、朝、聘、射、乡八种，即所谓：“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

^① 参见邹昌林《中国礼文化》，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王制》又分为六种，即所谓：“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然而，影响最大的，还要属源自《周礼·春官·大宗伯》“吉、凶、宾、军、嘉”的“五礼”分法。礼的这一划分方式，在两汉以降演变为历代礼典撰修的规范标准^①。“五礼”之首的“吉礼”，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各种祭祀的礼仪。由是观之，无论是哪一种划分方法，祭祀都是礼的体系中堪称至重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人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②今人李学勤先生也说，“礼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忽略了其中的宗教崇拜及有关的思想观念，于传统文化便不能有全面的理解”^③。詹鄞鑫先生认为：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作为“在朝的宗教”，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伦理、思想乃至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成为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④因此，从全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角度看，进行汉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便不无重要的意义。^⑤

其次，从古代祭祀本身来看，对鬼神的祭祀，是人们头脑之

① 除此而外，也还有“九礼”、“十礼”等种种说法，具见刘丰《20世纪先秦、秦汉礼学研究综述》，见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76-10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② 《礼记·祭统》。

③ 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李学勤先生《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另外，李学勤先生在为邹昌林《中国礼文化》一书所作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从儒家“六艺”的角度，引申而谓礼为“传统文化内涵的核心部分”。

④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⑤ 严耀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高级宗教很晚出现，关键就在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已经包含了宗教成分，其中主要是祭祀制度。对天地诸神的祭祀，给人以天人感应的神秘情感，对祖先的祭祀则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永恒。数千年来，从中央到乡族各种制度化的祭祀活动，不仅加强了统治者的神圣和权威，从而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性，而且由于宗教情结政治化的结果，使得国民中宗教观念相对淡薄，这对华夏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转引自王利华《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03-4-3。

中鬼神观念外化的反映。从人类早期鬼神观念形成之后，先民出于对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与恐惧，为了祈取自身与群体的平安与幸福，就形成了相应的献祭膜拜仪式。这种人们之于鬼神的崇拜仪式，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方面，鬼神观念首先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在人们还不能从科学角度认识客观世界的古代社会，对鬼神的顶礼膜拜是求得个人慰藉的心理需要。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古代社会中，对鬼神的祭祀与相关的巫术、占卜活动十分活跃，且始终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鬼神信仰虽然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但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同一个生存群体集体思维的产物，是他们群体的信仰。祭祀活动从产生之初就具有的这一群体性特征，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国家祭祀就是群体祭祀发展的高级形式。在历代王朝中，国家祭祀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巩固君主权威、贯彻国家意志、强化社会认同等多方面的政治、宗教功能。由于受所处时代、统治集团及统治者个人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朝代的国家祭祀不皆相同，因此具体研究包括汉代国家祭祀在内的历代国家祭祀制度，无论是从宗教史角度了解传统祭祀的发展形态，还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考察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都是有其意义的。

最后，从汉代社会的历史角度看，两汉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较为显著的几个时代特点：一是两汉承秦，继续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与官僚制度，巩固了秦所开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局面；二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儒学开始确立起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延续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三是两汉期间，随着自耕农阶层与豪民阶层力量的此消彼长，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依附关系成长迅速；四是自东汉初期佛教开始入中国内地后，民间传统的祭祀习俗与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又异化而产生道教。这样的社会现实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到国家祭祀领域当中。与此同时，汉代国家祭祀也对当时的社会有多方面

的影响，因此系统考察汉代国家祭祀问题，有助于增进对汉代社会发展总体面貌的了解和深化对汉代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

二、两汉国家祭祀研究回顾

迄今为止，有关两汉国家祭祀的研究，已有了相当丰厚的学术成果积累，这其中也包括古人的研究成果。不过，古今学者研究的历史背景与学术特点存在着较为明确的差别：古代学者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属于王朝政体下的礼学研究，具有为当朝祭祀制度建设提供借鉴的功利目的，并且这种研究也还常常囿于礼家师法门户观念的局限，因而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其科学性与客观性尚有缺憾。但他们从礼学应用的角度出发，对史实记述的订补、礼文细节的考证、礼典得失的评议等，还是有颇多可取鉴之处。如关于西汉前期祭祀制度最早的系统论述，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记述了西汉一朝祭祀制度的史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系统记述了东汉国家祭祀制度的专篇，是西晋时司马彪的《续汉书·祭祀志》，这些记述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的篇章，与历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考订增补的成果，（如《史记》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及张守节《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及近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汉书》有唐代颜师古《汉书注》及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有南朝刘昭《续汉书注》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等）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后来学者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唐代杜佑所著的《通典》，是中国最早的典志体史书，其中的《礼典·吉礼》十四篇，分类缕述历代祭祀制度的历史演变。关于两汉祭祀，《通典》不仅增添了一些“两汉书”所没有的资料，相关的分类也更有条理，而且在“本注”还夹有相关的议论评述，是记述与研究两汉国家祭祀问题的重要著作。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与《东汉会要》专述汉代典章

制度，在体例上延续了《晋书》与《通典》的分类方法，把两汉国家祭祀置于“吉礼”的条目下分述。尽管其主要的功夫在于史料的编次，没有体例上的创新；但是能够把散见于《汉书》、《后汉书》这两史“传”、“纪”部分的相关内容裒辑起来，与史志的专门记述融会论列，并注明出处，不仅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上的便利，同时也使其本身具有了特色。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古代王朝的祭祀制度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关的研究也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同时随着近、现代科学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学者有关两汉国家祭祀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学、宗教学或是其他相关学科的角度，总体上都属于客观性的科学研究。由于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是作为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而采用的，在此就不再赘加评述了。

20世纪90年代前的有关汉代国家祭祀的学术界研究状况，牟钟鉴先生在《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一文中，曾有过精彩的评述。他从宗教史研究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祭祀作了一个系统的介绍，称之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①。在列举了记述宗教祭祀活动的大量史著后，他指出：

可见古人是极重视传统宗教祭祀的，他们把这种宗教视为最正宗的信仰，作为国家宗教来对待。然而，它却被近现代学者所忽视了。面对如此确凿的历史事实和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学者似乎是视而不见，大家眼里只有道教和佛教。有些论著涉及到历代的祭祀和丧礼，但多着眼于社会习俗，而不把它当作可以与佛教道教相提并论的正统宗教；或者把它与儒学

^① 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载《世界宗教研究》，1990（1），1~14页。

混为一谈，用儒学宗教化的说法来代替传统宗教祭祀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或者只把它看成是夏商周三代的宗教，秦汉及其以后则付之阙如，似乎这种宗教已经中绝，被佛道教完全取代了。例如王治心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和香港陈佳荣的《中国宗教史》都是把祭天、祭祖、祭社稷当作战国以前的古代宗教来处理，秦以下便转到佛道教上面，不再提及它，这是令人遗憾的。按照这种写法，便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汉代只有迷信而无宗教，因为它处在三代以下，和佛道教兴起（汉末）之前，这当然是说不通的。

詹鄞鑫先生在《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①一书的“绪论”中也指出：

中国历来有“三教九流”的说法，所谓“三教”是指儒、道、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远不是“三教”所能概括，撇开每种宗教的流派不说，仅其门类就有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遗存的各种现在还没有确切名称的古代宗教。其中佛教于汉末开始传入我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唐以后陆续传入中国的。这些宗教不管它们后来是否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其源头毕竟不在中国。而道教和民间遗存的各种原始宗教，虽然其内容或多或少也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从根本上讲，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我们把这些土生土长的宗教都称之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稍许往前移一个世纪，就将发现，道教和民间（包括少数民族）遗存的各种宗教，都是“在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野”的宗教，中国还有一个在史书中以“礼志”或“郊祀志”的面目出现的、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灭亡的“在朝”的宗教。这种宗教既不是原始宗教，也不是道教，更不是佛教等外来宗教。它具有严密的制度和大体不变的承传，并与国家的政治礼制合为一体，是一种“国家宗教”，我们称之为“正统宗教”。奇怪的是，人们在谈论中国古代宗教时，往往把它给遗忘了。然而，它毕竟是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正统宗教”，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伦理、思想乃至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成为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牟、詹两氏几乎同时指出了以往在传统宗教问题研究上的这一盲点，当非偶然，而是对当时学界研究状况的如实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者的重视和学术环境的改善，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宗教祭祀研究的总体进步，也大大推进了两汉国家祭祀问题的研究进展。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总量看，关于两汉国家祭祀内容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远多于全面性的系统研究；现有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中，汉代国家祭祀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都是作为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出现的，成系统、有分量的专论尚未出现。

（一）关于两汉国家祭祀的研究状况

在郊祀方面，对西汉郊祀进行深入探讨的，有甘怀真先生的《中国古代郊祀礼的再思索：西汉成帝时的郊祀礼》^①和钟国发

^① 甘怀真：《中国古代郊祀礼的再思索：西汉成帝时的郊祀礼》，见刘增贵主编《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法制与礼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

先生的《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①,两者所侧重的都是对成帝时确立南北郊的意义的探讨;张鹤泉先生的《东汉郊天问题试探》^②,则是对东汉郊天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的重要文章,其中关于东汉郊祀礼仪的考究之全面、郊祀意义的阐释之透彻都是同类文章中最为突出的。

在社稷方面,劳干(贞一)先生的《汉代社祀的源流》与宁可先生《汉代的社》是两篇具有典范性的文章^③,前者重在考镜汉代社祀的源流,后者重在对置社的意义进行阐释。马新先生在《两汉乡村社会史》^④一书中,关于社祀时间问题的考证,也富有新意。

在宗庙陵寝方面,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⑤,对两汉的宗庙与陵寝制度的发展演变都有系统的阐述。张鹤泉先生的《东汉墓祭问题试探》^⑥,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包括皇帝陵寝在内的东汉墓祭存在的状况、祭祀的特点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巫鸿先生《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⑦一文,从祭祀建筑空间及祭祀者之于个体祖先的特殊情感等角度探讨了庙祭与墓祭的不同,颇有启发意义。

其他方面,如张鹤泉先生对东汉初期光武帝、明帝两朝祭祀

① 钟国发:《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载《福建论坛》,2001(2)。

② 张鹤泉:《东汉郊天问题试探》,见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③ 劳干:《汉代社祀的源流》,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宁可:《汉代的社》,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文史》,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④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⑤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⑥ 张鹤泉:《东汉墓祭问题试探》,见《秦汉史论丛》,第6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⑦ 巫鸿:《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制度建立与完善问题的论述、^① 蒲慕州先生对汉代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关系的探讨、^② 李成九先生对汉武帝封禅祭祀两重性的揭示^③、金子修一先生对皇帝祭祀问题的探究^④等，均是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二) 与两汉国家祭祀相关的研究

迄今为止，对两汉国家祭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詹鄞鑫先生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陈成国先生的《秦汉礼制研究》^⑤、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⑥、张荣明先生的《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⑦以及杨英先生的《四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⑧。对于这些著作在汉代国家祭祀研究上的具体贡献，后面的相关章节中皆有吸取和借鉴，这里仅从宏观角度作一概要的评述：

詹鄞鑫先生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是一部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祭祀的佳作，该书分“传统诸神”、

① 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汉明帝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② 蒲慕州：《汉代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之四），下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7。

③ [韩]李成九：《汉武帝的封禅和巡狩》，2002年8月中国秦汉史第九届年会论文。

④ [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一考察》，载《史学杂志》，87（2），1978年2月出版；《皇帝祭祀的展开》，载《世界历史》（9），又见[日]渡边义撰，张学锋译《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7）；据闻，2001年他将相关论文结集为《古代中国之皇帝祭祀》，在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⑤ 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按：2002年由原社再版，更名为《中国礼制史·秦汉卷》。

⑥ 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⑦ 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⑧ 杨英：《四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宗教制度”与“宗教礼俗”三个部分，对中国的传统宗教——即著者所谓“以‘正统宗教’为主的，包括道教和各种民间遗存的原始宗教在内的，但排除了外来宗教及其渗合内容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研究侧重溯源，长于名物考究，在时段上以先秦为主而兼及两汉，魏晋以下略省；关于两汉祭祀问题，多是按时间的先后与先秦制度放到一起阐述。在研究的理论深度及内容的系统性有机结合上，至今也未见有超出其右者。

陈戍国先生的《秦汉礼制研究》，是其中中国礼制史系列著作之一。陈先生学承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先秦礼制研究》，^②是礼制断代史的开山之作。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秦、西汉、莽新政权、东汉各时期以及各时段边远民族的礼制内容。对于汉代国家祭祀，著者是其作为汉礼的组成部分，按照天神、地祇、人鬼的神祇分类阐述的。该书受体例的限制，对祭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充分展开，故尽管不乏有诸如“祭礼之在西汉，就整体或大端而论，实无定制可言”的卓见^③，但系统性与深入程度都略显不足。

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秉承任继愈先生的儒教说，是一部立论颇有个性化的巨作，面世之后招致不少讥责之辞。如不考虑立论上的偏颇，其在汉代学者的祭祀思想、郊祀的演变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对研究汉代国家祭祀制度还是多有可借鉴之处的。

张荣明先生的《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是在其前著^④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政治宗教”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论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绪论》，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② 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002年再版后，更名为《中国礼制史·先秦卷》。

③ 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1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④ 张荣明：《殷周政治与宗教》，台北，中华发展基金会与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1997；《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证。该书以理论思辨与建构见长，对汉代国家祭祀的相关研究侧重于政治功效的阐释。其中关于汉代国家信仰的创立、皇庙的政治意义、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都颇有见地，尤其是其理性的思考颇富有启发性，这与詹著侧重名物考证的特点恰有互补之效。

杨英先生的《四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这是研究古代祭祀的宏观性著作中，对汉代国家祭祀相关阐释较为厚重的一部——在全部五章中，汉代的内容占两章，即第三章“渐进和‘复古’：西汉——从国家祭祀到系统王朝祭礼的演变”与第四章“定型：东汉‘治出于二’的新格局下王朝祭礼的定型”。与张著一样，杨著所探讨的对象，也是隋唐以前古代国家祭祀的流变过程。但二者的立意不同，张著认为国家祭祀是一种政治宗教，故从政治哲学与宗教学的角度对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入阐释；杨著认为国家祭祀是礼典而不是宗教，故着力于探讨政事与礼教从三代“治出于一”，到战国以降“治出于二”的演化过程及规律。杨著主要的目的，在于考察王朝祭礼从西周到魏晋的流变过程，所以对汉代国家祭祀具体内容的考察上着力不多，考察的范围也没有超出古代礼的礼典、礼容与礼意的范畴。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为汉代国家祭祀问题的接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相对于两汉史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有关祭祀问题尤其是国家祭祀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既缺少有分量的系统研究专论，也缺乏有深度的祭祀管理问题探讨；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对祭祀问题在理论视角、阐释方式乃至在具体史实认识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两汉国家祭祀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